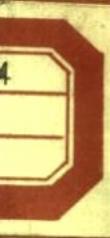




安多藏族史略



宗华 李延恺 著



PDG

安多藏族史略

黎宗华 李延恺 著



安多藏族史略

黎宗华 李延恺著

*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69,000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20-0296-1/G·253

定价：3.40元

0005361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安多藏族之来源	(5)
一、考古证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6)
二、猕猴与岩魔女的后裔是高原最古老的土著居民.....	(9)
三、部分古羌人与青甘藏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11)
四、部分吐蕃人、鲜卑吐谷浑人参加到安多藏族大家庭.....	(14)
五、部分汉人、唃末人及蒙古人成为安多藏族的成员.....	(18)
第三章 远古与奴隶社会之安多	(21)
一、远古时期之安多.....	(21)
二、奴隶社会之安多.....	(22)
三、奴隶制吐蕃王朝之建立.....	(24)
四、蕃唐和亲之历史丰碑.....	(26)
(一)文成公主经甘青与松赞干布联姻.....	(26)
(二)金城公主经甘青和亲赤德祖赞.....	(29)
五、噶尔·东赞父子东向及蕃唐大非川之战.....	(31)
六、蕃唐赤岭划界立碑与交马互市.....	(34)
七、吐蕃控制青海东部及陇右.....	(37)
八、蕃唐清水、平凉及长庆会盟.....	(41)

2013.7.13

九、吐蕃王朝衰亡时之安多	(44)
十、经济、语言、文化	(47)
(一) 经济	(47)
(二) 语言、文化	(50)
十一、宗教信仰	(51)
十二、蕃唐文化交流在安多之反映	(53)

第四章 由奴隶制向封建农(牧)

奴社会过渡之安多	(54)
一、封建割据局面之出现	(54)
(一) 沙州张义潮起义	(54)
(二) 甘青温末起义	(55)
(三) 凉州六谷部封建地方政权	(59)
(四) 唃厮啰封建地方政权	(61)
(1) 历史背景	(61)
(2) 唃斯啰其人(997—1065)	(62)
(3) 唃厮啰政权诞生	(63)
(4) 唃厮啰执政	(66)
(5) 唃厮啰政权衰亡	(70)
(6) 经济、技术及商贸	(72)
(7) 文化与宗教	(73)
(8) 风俗习惯	(78)
二、过渡时期之封建农(牧)奴社会	(79)

第五章 封建农(牧)奴社会前期之安多

(元朝对甘青藏区的施政)	(83)
一、元朝初领甘青藏区	(83)
二、萨班的历史性贡献	(86)

(一) 会晤阔端，西藏划入祖国版图	(86)
(二) 创制旧蒙文	(88)
(三) 为阔端治病和弘法	(89)
三、以联姻和派官推进对藏族的统治	(89)
四、八思巴的丰功伟绩	(90)
(一) 继承伯父遗志，进一步	
加强与中央的关系	(90)
(二) 为忽必烈夫妇等三次灌顶	(90)
(三) 受封国师，主持总制院	(91)
(四) 三次往返于萨迦及大都	(92)
(五) 创造新蒙文，晋升帝师	(93)
(六) 在香根及青南的活动	(94)
(1) 接纳并举荐丞相桑哥	(94)
(2) 实行抑本倡佛政策	(94)
(3) 在青南的活动	(95)
五、清查户口与土流并行	(100)
六、萨迦王朝的灭亡及帕竹王朝的建立	(103)
七、文化和宗教之发展	(104)
八、婚姻形式	(111)
附 萨迦派历任元代帝师表	(114)

第六章 封建农(牧)奴社会之安多

(明朝对甘青藏区的施政)	(116)
一、明朝在甘青藏区设置统治机构，	
推行土司制度	(116)
二、明朝“多封众建”政策在甘青藏区之实施	(120)
三、甘青藏族的朝贡及明朝之赏赐与马赋	(125)

四、甘青藏族与明朝之茶马交易	(126)
五、甘青藏族之农牧业经济	(128)
六、甘青藏族之文化教育及藏医	(130)
(一) 文化	(130)
(1) 历史与历史文学	(130)
(2) 传记文学	(130)
(3) 作家诗	(131)
(4) 民间文学(含史诗、民间故事)	(131)
(5) 建筑和艺术	(133)
(6) 藏戏	(134)
(二) 教育	(134)
(三) 医疗卫生	(135)
七、格鲁派在安多之兴起	(136)
八、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	(139)
第七章 封建农(牧)奴社会中期之安多	
(清朝对甘青藏区的施政)	(146)
一、清代甘青藏族之分布	(146)
二、清朝治理甘青藏区之方略	(149)
(一) 在中央设置理藩院,	
以统治边疆各民族	(149)
(二) 在甘青设府县厅, 派遣流官	(150)
(三) 在甘青藏区实行千百户制度,	
对藏族进行分化瓦解	(152)
(四) 增加驻军, 加强戍守	(154)
(五) 利用藏传佛教, 继续政教合一	(155)
(六) 整顿藏传佛教寺院, 革除明代喇嘛封号	(158)

(七) 实行以茶易马法，改变茶马互市制度	(159)
(八) “抑蒙扶番”与“抑番扶蒙”	(160)
(九) 差赋摊派，困扰藏胞	(162)
三、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始末	(164)
四、甘青藏族人民之反帝斗争	(168)
(一) 甘肃藏民的反帝斗争	(169)
(二) 青海藏民的反帝斗争	(169)
五、清军疯狂镇压果洛藏族与果洛人民的 顽强反抗	(171)
六、甘青藏族经济与帝国主义的掠夺	(172)
(一) 农牧业经济	(173)
(二) 寺院经济	(174)
(三) 工商业经济	(175)
(四) 帝国主义之掠夺	(176)
七、甘青藏族文化之巨大发展	(177)
(一) 知名学者及其著作	(177)
(二) 独具特色的德钦藏戏	(179)
八、格鲁派在安多之发展	(180)
附 清末青海藏族部落分布情况表	(183)

第八章 封建农（牧）奴社会末期之安多

(民国时期)	(186)
一、社会性质	(186)
二、马步芳家族对甘青藏族采取的反动政策	(198)
(一)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	(198)
(二) 血腥镇压，掠夺财产	(199)
(1) 对果洛藏族的七次镇压与果洛人民的顽强反抗	

.....	(199)
(2) 对玉树藏族的九次镇压与玉树人民的反暴斗争 (204)
(3) 对黄南藏族的五次镇压与黄南人民的愤怒抵御 (208)
(4) 马麒两次弹压拉卜楞寺与当地	
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211)
三、玉树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及九世	
班禅返藏问题 (213)
(一) 玉树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213)
(二) 九世班禅返藏问题 (219)
四、红军经过青甘藏区及藏族人民支援抗日 (220)
(一) 红军经过青甘藏区 (220)
(二) 藏族人民积极支援抗日战争 (223)
五、声势浩大的“甘南民变”及其它 (224)
六、发展缓慢的文化教育 (226)
(一) 安多藏戏 (226)
(二) 藏族教育 (226)
(1) 学校教育 (226)
(2) 寺院教育 (228)
七、十四世达赖及十世班禅在青海之认定 (234)
(一) 十四世达赖在青海之认定 (234)
(二) 十世班禅在青海之认定 (235)
八、从黑暗走向光明 (237)

第一章 緒論

研究安多藏族历史，实际上是研究安多藏族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研究藏族人民生活的发展阶段，藉以总结过去，启迪未来。

藏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又是青藏高原的主人。藏族人民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和汉族人民及其它兄弟民族人民始终同命运，共患难，在维护和促进祖国的统一、安定和昌盛的斗争中，结成了异常亲密的兄弟友谊。

藏族居住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习惯上分为三个大的不同地区，即上阿里地区、中卫藏地区、下多康地区，藏籍中则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其中多康又分为多堆（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与多麦（今青海省及甘肃省南部藏族地区）。居住于藏族地区之人，亘古至今，一贯自称“扎西”。唯因方言差别，又有不同称谓：居住于西藏阿里地区的人称“堆巴”，后藏地区的人称“藏巴”，前藏地区的人称“卫巴”，昌都以东地区及青海玉树地区的人称“康巴”，除玉树以外青海省其它地区、甘肃南部与川西北的人称“安多哇”。这些称呼，就象汉语中的“南方人”、“北方人”等称谓一样，仅是对某一区域居民的称

呼，而绝非民族称谓之异。藏族则是该民族的汉语称谓。

安多藏族的历史，是中国藏族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多”是个地域概念，具体地讲，就是操藏语安多方言的地区。此地十分辽阔，她包括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外的青海全部藏区（但为了青海省的整体不被分割，我们在述及安多藏族史时亦将玉树包涵其内）、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河西藏区，以及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那么，为什么将这一地区称做“安多”呢？蜚声海内外的藏族历史学家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于1856年撰就的《安多政教史》（以下简称《安史》）及本世纪初问世的《塔尔寺志》中云：“阿卿岗日（玛沁雪山）及多拉让摩（积石山）二山，取其首字，并称为‘安多’”。由此可知，所谓“安多”，就是以积石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区。《安史》作者认为：这个地区以黄河为主流，注入北部者有浩门河（浩门河），中部为湟水（湟水），南部为隆务河（隆务河）、大夏河（大夏河）、洮河（洮河）诸水；再加上白龙江（白龙江）上游与阿坝地区的安水（安水）、白河（白河）、黑河（黑河）以及岷江、大渡河流域，统统称为“安多”。历史上的安多地区、尤其河湟地区，是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许多古代民族都在这里生息过。有人说，河西是民族走廊，河湟地区是民族表演的舞台。所以，研究安多藏族历史，就必然会涉及到其它地区的藏族，乃至羌、吐谷浑、汉、蒙古、满、土等民族。

在安多地区，藏族与汉族是主体民族（从历史与人口而言）。此外，尚有回、土、撒拉、蒙古、东乡以及裕固、保安等民族。因而其境内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出多元性的特征。

藏族及她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是公元7世纪以后才逐步

形成的。但是安多地区的人类历史却可以追溯到3万年之前。秦、汉以还诸羌大都活动于这一地区，且曾在此建立过许多地方政权。吐蕃兴起，逐渐形成为一个有较高文化的藏族共同体，这里的部分羌人（如党项等）、吐谷浑人、蒙古人、汉人等陆续地融合于藏族之中。从7世纪开始，迄今已逾一千多年，原有之族名或部落名已不复存在了，但它们的遗迹仍然隐约可寻。

元代统一整个青藏高原，曾在这一带设立过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青、甘藏区及四川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地区，并建立了千户、百户制度，以协助其进行统治。同时，由于元室推崇藏传佛教，加强了安多地区的宗教势力，殊是萨迦派势力，宗教便成为安多地区与卫藏地区保持联系的主要纽带。有元一代，萨迦教派是广大藏族地区的统治教派，其寺院和属区遍及安多地方。后来噶举派的帕摩竹巴当权，他在这里也发展势力，西藏的各个教派在此地都有它们的寺院与属民。明代以降，安多出现了多教派竞争的局面，在藏传佛教传入本地区之前，本教亦有相当势力。迨及清初，格鲁教派利用蒙古和硕特部的势力镇压其它教派以后，格鲁教派方在这一带占据了优势。

在元、明、清三朝，安多都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国师、呼图克图、千户、百户、土司及寺院集团分别统治的，在政治上并不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只是宗教关系使他们与拉萨抑或其它教派中心保持着密切联系。元、明、清三朝利用寺院集团进行统治，使得安多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牧）奴制度延续下来，且严重地阻碍了藏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安多的绝大部分地区及青海玉树又成为马

家军阀的天下，藏族人民头上又加了一座大山。然而，他们的压迫与剥削也激起了藏族与其它民族多次强烈的反抗。于此尚须强调指出的是：在这期间，长征的一部分红军部队曾经过青海南部及甘肃南部地区，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另外，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甘、青的广大藏族僧俗群众自觉自愿地捐款捐物、召开声援大会、念经祈祷，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8.9月间，甘、青藏区在藏族僧俗群众的大力配合下，获得解放。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藏族人民见到了光明，得到了新生，当家做了主人。

第二章 安多藏族之来源

关于藏族族源问题，解放前后在学术界颇多歧见，什么源于印度说、源于马来半岛说、源于缅甸说、源于鲜卑说、源于西羌说（含羌即藏说）、汉藏同源说等等，争论异常热烈。前三说可以概括为“南来说”。这些观点被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西藏、在青海、在甘肃的大量考古发现及其挖掘出的以十数万计的各种地下遗存所一一否定；后三说亦被上述地下遗存和汉藏文古籍记载，作了一些肯定与否定，其科学研究成果集中见诸于近几年面世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与王辅仁、索文清所撰著的《藏族史要》（以下简称《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这两部重要著作之中。

如前所述，安多藏族是中国藏族的一部分，其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按理说，在藏族族源问题之外再提一个安多藏族来源问题，就显得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然而要发展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连它的来龙去脉都搞不清楚，是难以设想的。藏族谚语云：“不了解先祖历史的人，好似未长尾巴的猴儿。”因此，颇有必要弄清安多藏族的来源问题，即她是怎么来的、来于何处、源于何时。

我们知道，民族的诞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道路是曲折的（氏族——部族——部落——民族），其成份是复杂的。既要注意文字记载，更要注意考古发掘，还要注意民间广泛流行着的史前传说，并对其做综合科学的分析。研究安多藏族的来源亦莫能例外。

一、考古证明，青藏高原是 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我们且不谈解放后我国科学工作者1952年在西藏的聂拉木县发掘的细石器、1958年在林芝县发现的古人类头盖骨、1959年在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1966年在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霍尔区采集到的256件旧石器、1966年在聂拉木县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3年在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的磨制石锛等、1974年在林芝县发现的一批磨制石器陶片及1975年在该县发现的古人类化石、1977年在墨脱县境内雅鲁藏布江两岸台地上发现的一批新石器及绳纹陶片、1978年在昌都卡若村发现的4,600年前的村落遗址等等，仅简要地谈谈青、甘两省的考古发现，即可窥其一斑。据不完全统计，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发掘地下遗存3,000多处、出土文物10万余件。其中在海拔3,500米至4,200米的玉树柯柯西里与托托河沿岸的谷地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1万年以前人类即已在此地活动。他们除了采集与狩猎，尚驯化与豢养动物，从事畜牧业生产。柴达木盆地塔里塔哈出土的文物说明，在3,000多年前，这里的畜牧业生产已高度发展起来，如诺木洪河岸矗立着11座用土坯及木料建造的房子，有方形的，亦有圆形的，排列有序，十分别致；不远处是牲畜圈栏，出入口安有木质栅门，内有绵羊、牦牛、骆驼及骏马；屋角放置着骨、石及铜质各种生产工

具；院内有1辆木轮大车；屋里陈设着彩绘精美、形状别致的陶器，显眼处则站立着1头陶制牦牛；主人不论男女老幼均穿着彩色毛织品缝制的衣服，其色泽以黄、褐为主，间有灰、黑、红、蓝等色条纹，腰系彩色毛织带，足登革履；妇女佩戴着石、骨、牙、蛤蜊壳制做的装饰品，正在用石轮纺毛线；而男子则在拧着毛线。此外，在民和县马厂古文化遗址、乐都县柳湾古文化遗址、湟中县卡约古文化遗址、贵德县罗汉堂古文化遗址、青海湖西岸古文化遗址等处也都出土有石纺轮、陶纺轮及牛、羊、马骨，有的遗址尚出现了猪骨。这些文化属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系原始公社时期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的象征。它说明湟水沿岸、黄河谷地、青海湖周围，是古代先民经营畜牧业的好地方。科学工作者在柴达木地层中发现的旧石器和南极石中包括刮削器、雕刻器、钻具与砍斫器等石制工具，制于距今3万年左右的晚更新期（《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第76页），从而又把青海的人类史向前推移了两万年。考古还发现，居住于青海的古代先民很早便开始制造陶器，湟水流域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是青海最早的陶器，属仰韶文化，距今6,000余年。这一时期的陶制品多彩绘，色橙黄，纹饰以黑色为主，上面图案有波纹、方格纹、几何纹等，有的并将人与动物绘于其上。器形有碗、盆、罐、钵等。在马厂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散见于民和、乐都、平安、西宁、湟中等地，它晚于马家窑陶器，其形状精美，纹饰增多，计有回纹、波纹、几何纹、三角纹、圆圈纹，有的还将犬绘于陶器之上，其中以三角纹最为常见。在青海的东部农业区和海南、海北等地尚有不少齐家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壁薄质坚，呈桔红色，其双耳大罐比较独特。齐家文化代表父系氏

族社会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约当夏代。从乐都柳湾之1,500座原始墓葬中出土的3万余件文物，陶器占一半多，且多系彩陶。这些都是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的遗存，制作规范，表面光洁，以黑红二色绘成各种几何图纹，技艺精湛，被誉为“彩陶之乡”。卡约文化是青海特有的一种古代羌族文化，形成于周初（因为在其出土的青铜器中，铜戈与铜锬的形式，与内地周代文化相近），它首先在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村被发现，其分布以湟水流域为中心，东起甘、青交界之黄河沿岸，西迄海南，南抵黄南。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小块地区兼营农业。其陶器底部大都凹入，多素面，少彩绘，纹饰简练，标志着古代制陶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器，纹饰以螺纹、涡纹为主，器形有双耳盆、单耳杯等，形状与纹饰相和谐，如舞蹈纹盆，内壁有5人一组的古代妇女，手牵着手翩翩起舞，个个发辫萦后，饰带飘移，步履轻盈，极可能是古羌之妇女形象。考古工作者还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朱格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其中包括这一文化类型独具的尖底瓶陶片等，并有石斧、骨锥、骨针、骨叉等工具及陶环等装饰品。研究人员认为这一遗存涵有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3种文化类型。以往的考古资料说庙底沟文化类型的最西端是民和县的转导、官亭一带，而这一新发现则使仰韶文化向西跨了一大步。1987年，科学工作者又在青海湖畔黑马河地表1点5米以下发现了10余件旧石器与大量炭碴、灰烬等。这批石器包括弧刀刮削器、雕刻器、钻贝、砍斫器、龟背状石器，其器物原料有石英石、玛瑙等，年代距今1万年左右。另外，考古工作者自解放以还，尚先后在甘肃省的下河清马厂类型文化遗址、永靖大河庄和玉门火烧沟的墓葬中